

浙江十大文化名人志

一九八七年

总 序

夏 衍

远在五万年前，浙江就有“建德人”生活在这里，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非常丰富，尤其是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浙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自古以来，浙江不仅山川秀丽，也是人文荟萃之地。不说远古，南北朝的沈约、谢灵运，到近代的龚自珍、王国维，现代的鲁迅、茅盾、郁达夫都是浙江人。当然也还有许许多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前者从王充、陈亮、黄宗羲、朱舜水到蔡元培，后者可以从沈括、毕昇，一直数到当今的钱学森、钱三强，他们也都是浙江人。以上仅略举数人，浙江作为“文物之邦”，可见一斑。我作为浙江人，对此是常引以为自豪的。

现在我们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大转折时期，新旧交替时期。在文化建设上比较突出的有一个创新和传统关系问题。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灿烂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制度延续了几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文化传统，既是珍贵的遗产，又是沉重的包袱，也就是文化传统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分析，区别对待。有人认为要创新就必须与传统一刀两断、彻底决裂，我看这个问题应该慎重讨论。五四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好象这个口号也是浙江人钱

玄同先生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很果断，也很彻底，但是缺乏具体分析，所以结果不仅没有打倒，反而因为树敌太多，引起了一股尊孔逆流。中国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久，人口如此之多，象孔子那样的学说能够在这样一个国家延续两三千年之久，假如它全是糟粕，没有一点精华，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民族之所以能够以勤劳、勇敢、智慧自傲，看来儒学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所以我认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不能一刀切，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时期，要鼓励人们大胆地探索，勇敢地创新，西方文化的各种思潮、各种流派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封建的、闭关自守的、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传统，同时也要继承、吸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传统。

《浙江文化丛书》是本着这个精神编写出版的，因此我是很赞同的。

浙江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不仅仅出过很多人才。陶瓷、丝织的发明在浙江；作为成熟的中国戏曲艺术也诞生于浙南的永嘉；古越的书院、出版和藏书都非常发达；至于学派，如浙东学派整整影响了有清一代。昔日浙江的文化如此昌盛，当非偶然现象，有它的发展规律，有自身的因素，也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为此，都应当予以必要的探索，加以总结的。这对今天发展和繁荣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以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也是十分必要的。我相信素有“文物之邦”誉称的浙江，一定能发扬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培养出比以前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振兴中华，建设经济富庶、文化昌盛的新浙江，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986年深秋

《浙江十大文化名人》序

傅璇琮

近几年来，文化问题的讨论，已成为思想界、学术界的一股新潮流。正如上海和北京的一些报纸所说，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一股“文化热”。文化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一门新的学科——文化学，正在形成。

这就使我们想起了近代中国的两位大学者的话，他们一个是王国维，一个是陈寅恪。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静庵文集续编》，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根据他所揭橥的这一主张，王国维列举了“此二三十年发见之材料并学者研究之结果”，计有五项：（一）殷虚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陈寅恪则专就敦煌发见的材料立说，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

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述两段话都是本世纪初一、二十年说的，他们根据当时地下发掘的新材料，运用于研究中去，在各自的领域内作出新的开拓。王、陈二位都是他们领域中的大师，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能不囿于旧的书面材料，勇于接受地下发现所得，确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日而喻。在当时的学术界，他们确是走在前列的。但他们对学术新潮流起因的解释，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们还是较侧重于文献材料，以为有新资料才能有新学问，而不大注意于社会变革对于学术思想的重大影响。这是前贤所受时代的局限，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看来，新学问、新潮流之起，恐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社会原因，是社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化，引起思想界，从而在学术界，促进对旧学问的冲击和改造，新学问的兴起和繁荣。这倒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就以近些年来的“文化热”来说，在此之前，学术界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新材料，如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安阳甲骨、敦煌卷轴那样震惊于中外。有的，则是在中国广大城乡出现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改革。这是一项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所触及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心理结构，都处在变化和前进之中。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必然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审视，加深对目前正在兴起的一些新的文化观念的思考。可见，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热”是有其深厚的现实生活

的土壤的，这是这门新学问获得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如果说新材料的话，那末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就是任何地下发掘也无从比拟的丰富而深刻的新材料，那是研究者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即使传统的书面文献资料，处于今日的文化研究的整个系统中，也将会以新的面貌为研究者所利用。

从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文化的研究，似乎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改革的实践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的研讨，一类即是史的研究。这两大类互有关连，各有其研究对象。我们固然需要进行宏观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和讨论，但不能长时间停留在这一步，为了研究的深入，必须把对象相对稳定，范围适当缩小，尤其是对文化史来说，似更应如此。

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浙江文化研究丛书”，我以为是虽稍偏重于史的研究，但又能从传统文化的研究来观照现实问题；同时，又能立足于本省，从地域文化研究出发，进一步丰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内容。这一设想是有开创性的，必将获得新的开展和成功。而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种《浙江十大文化名人》，为在浙江历史上产生过的、对整个中国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立传，由此反映浙江文化的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成就，其选题也是十分合适的。承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好意，要我为这部著作写一序言，我却觉得未必合适。因为本书的作者都是各自学科的专家，他们撰写的这十篇传记，大都从他们原有深厚的蓄积中提炼而成，有不少还在原有著作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补充和修订，使立说更为扎实，见解更为宏通。而我对这些方面却缺乏专门研究，除了乡籍也是浙江之外，确没有资格为本书作序的。我只不过在中华书局这一古籍整理出版的机构中做过若干年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倒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特别是国务院古籍

整理规划小组重新建立以来，因为工作的需要，较为广泛地接触到文学、历史、哲学，以及语言文字等学科领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也可以说是同行，我对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眼光与魄力表示欣赏，同时对于他们把开创勇气与求实作风相结合，踏踏实实地把文化研究真正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而不是追求一种时髦，也是深感钦佩的。因此不揣浅陋，冒佛头着粪之大不韪，写了这篇序，但我想还是难以副出版社同志的殷望的。

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相当的发展。良渚文化且不说，七十年代在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种崭新的文化遗存，后来命名为河姆渡文化，差不多也可以是震惊中外的。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浙江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都同样存在着灿烂的原始文化，应当构成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源地的一部分。本书的十位文化名人传，更加有力地证明，浙江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如何的贡献。文化名人的产生不是孤立的。时间流失了，具体的历史进程逐渐模糊了，以至流传到现在的只是一些个人。但这些个人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尤其是一些杰出人物，从他们的著作和活动记载中，是能较为充分反映他们的时代的。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美学思想家丹纳说过：“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艺术哲学》，第三编《尼德兰的绘画》，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版）丹纳这里说的是画家，我觉得可以扩而充之用于一切有才能的历史人物。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其背景是当时整个的历史，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发达的历史。应当说，本书所写的十位人物，他们的活动是有全国意义的，他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培养他们的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因此，他们不只是

浙江的“乡贤”。光是浙江的文化还不足以承担得起他们的教养。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在浙江长大的，他们与浙江有着先天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他们的全部活动和著述有着深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鲁迅先生身上可以看得很明显。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这几位名人的传记，可以看出我们浙江文化在历史上达到的程度。这一点，也应该促进我们的学术工作者进一步去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它是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和融汇而成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多姿多彩。没有地方特色，也就没有整体风格；不研究地区文化的特点，也不可能对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准确的判断。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不同，吴越文化与楚文化也有不同。研究地区文化的特点，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有志者如从事于此，必将大有所获。

另外，我觉得，人物的研究还应当与社会的风尚习俗研究相结合。我们现在看《清明上河图》，恐怕倒不在于观赏人物车马的笔法，而是神游于图中那种细腻生动的社会生活 and 人民习俗。这幅图距现在已相隔千年，图中描绘的生活与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完全两样了。但人们还是有兴趣观看，它的魅力仍然存在，这个道理是很值得思考的。其中一条，可能是人民对自己生活痕迹的怀念，这是一种深刻的感情。而风尚习俗则是构成生活痕迹的重要部分。陆游的诗，写山阴的特别多，尤其是中年以后。我觉得，读他的这些诗，总能使人感到浙江乡村的一种特有气质和风光。长久在本地生活的可能不一定体会到，远在外地的人，时间稍久，读陆游的诗，那种特定环境的乡思之情会油然而生。这就是陆诗的醇厚处，而这就与他的诗反映浙东地区的社会习尚分不开的。研究文化名人，特别是研

究作家，注意他们所表现和反映人民生活的痕迹，将会大大扩展研究的天地，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

浙江文化名人不止十个，本书所列应当说是远远不够的，有些很有特点的，并未列入，如明朝的徐渭（文长）。有些人名气不是很大，但在文化史上有其独特的贡献，特别是一些民间艺人、匠人，由于他们与人民生活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创造就更值得珍视。我希望我们今后不要拘于整数，——这种文化观念和思维模式，在现在新的形势下，恐怕也是应当有所突破的。不知出版社的同志以为然否？这套丛书的其他一些选题，就我个人来说，可能比本书还使我更感兴趣，如浙江的佛教等。我也希望能把浙江的山水胜景，浙江的手工业和民间技艺等，纳入选题中去，极愿早日能读到它们。但它们的难度可能更大。唯其如此，我们更盼望它们能早日写就，早日出版，这对于我们整个文化史以及整个文化问题的研究和开拓都将是一个促进。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北京

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

蒋祖怡

我国东汉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家王充，字仲任，生于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三年，卒于和帝刘肇永元八年至永元十六年之间。（《后汉书·本传》云：“永元间，病卒于家。按：永元共十六年。”）享年七十余岁。

王充的一生，经历了东汉四代帝王统治时期：即汉光武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和帝刘肇。他诞生的那一年，正是赤眉农民起义失败的那一年，他卒后五十多年，揭开了汉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在他一生中，虽则也有不少次农民暴动，但是，东汉政权还是比较稳定。所以统治者得以大力宣扬唯心主义神学——“天人感应”，如当时帝王所推行的谶纬之说，用来麻醉广大人民，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后来南朝梁代的刘勰在他的著作《文心雕龙·正纬篇》中说道：

至于光武，笃信斯术。（“谶纬之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

到光武的孙子章帝刘炟，又大举在“白虎观”召集许多经学之士和谶纬家讨论，叫班固把会议记录下来（其中主要是把五经和谶纬之学混同起来），叫做《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

通》)。

王充用他毕生精力所撰写的八十五篇《论衡》，正是用来反对当时统治阶级所大力宣扬的唯心主义神学——“天人感应”的理论的。他在当时自然科学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运用大量科学的材料，批驳了“天人感应”和其他种种迷信、虚妄的说法。在形、神的关系问题上，他坚持“形具而神生”的唯物主义原理。在认识论方面，他强调重视直接经验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同时，他还主张“今胜于昔”的进步历史观，主张文学作品的语言要通俗易懂，不要因袭模仿。他不但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而且对后代史学、文学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寂寞、战斗的一生

王充的原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市境）。他的远祖，因为从军有功，封在会稽阳亭（今浙江省绍兴市境）；不到一年，失国从农，就以会稽为家。他的曾祖父刚勇好斗，在世乱年荒的时代里杀了人，他祖父王汎把家迁居在钱唐县（今杭州市境），从事商贩。王汎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王蒙，小的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蒙、王诵，比他们的祖宗还要刚勇好斗，与钱唐一丁姓的豪家结下了怨仇，因此，又徙家到上虞（今浙江上虞县）。王充就出生在上虞。时为建武三年。因此，《论衡·自纪篇》中他自称“细族孤门”。在重门阀的东汉，他的出身是微贱的。

王充幼年，在书馆里念过《尚书》、《论语》等经典著作；长大后，在县、郡当过“功曹”等小官，因为与上级意

见不合而自动离职，最后，依靠农村塾师的菲薄收入以维持生活。《自纪篇》中自述他自己晚年的生活状况道：

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俸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

他毕生过着困顿的生活，老而弥艰，但他却能“乐天知命”，诚如他自己所说的：“贫无一亩庇身，志逸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

当时给王充在精神上最大的舆论压力，是他的贫贱出身，因此，王充对此有所辩白。《论衡·自纪篇》：

或嘲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

答曰：鸟无世，凤皇；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物无常，嘉珍。才高见黜，遭时而然。士贵，故孤兴；物贵，故独产。……母驺犊驂，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傍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杨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遁出君山。更禀于元，故能著文。

王充的这一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话，连唐代思想较为活跃的刘知几、宋代的王应麟都因为他把鲧与叟比作自己的祖先，而把禹和舜比作自己，说他“不孝”，指斥王充是“名教之罪人”！

王充在一生中，也受过政治迫害，不过什么原因，颇难具体了解。在《论衡·自纪篇》里有这么一段话：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避难（“难”字通津本缺，《书抄》，《意林》、《御览》引均作“徙家避难”，是。），诣扬州郡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①材小任大，职在刺割。^②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一本作“三年”误，章和仅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这段话里较清楚的有两点：第一，他此次远离上虞，到扬州治所去是“避难”，而且和他祖宗一样是“举家担载”而去的。第二，这次“罢州家居”是自动离职的，离职的原因是：“材小任大，职在刺割”，也由于“年渐七十，时可悬舆”，即是说，已到告老的年龄了。

王充为什么以近七十之年，还要全家到扬州郡部去避难呢？我们也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一些旁证材料。

《后汉书·章帝纪》载七月丁未诏：

自往昔大狱以来，拷掠多酷，黷钻之属^③，惨苦无极。

又十二月壬子诏：

往昔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

关于王充的生平历史的记载，最为详尽的是他《论衡》中的《对作篇》和《自纪篇》。此外，主要有范曄《后汉书·王充传》。此传记载了几条《论衡》中未载之事：一、说王充“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二、“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通众流百家之言。”三、“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户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四、“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五、“永元中，病卒于家。”

谢承《后汉书·王充传》（见《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及范晔《后汉书》注引）、袁山松《后汉书》、韩愈《后汉三贤赞》、阮元《畴人传》等均有有关王充生平的资料，择要录之如下：

袁山松云：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范书本传注引）

《事文类聚·别集二》引《抱朴子》亦载此事。具见《论衡》的流传，为蔡、王两氏之力。不然在汉代这样一部“离经叛道”的书，肯定是被禁止的。当然，这和当时东汉季世的政治环境也有密切关系。

王充的著作，据现存的记载，有《政务之书》（不悉篇数），《讥俗节义》十二篇，《论衡之书》八十五篇，《养性之书》十六篇。今独《论衡之书》尚存。（其中缺《招致》一篇，仅存八十四篇。）其他著作现均亡佚，但所亡之书的主要内容，尚可查考。今略述于后：

《政务之书》——见于《论衡·对作篇》。同篇还记载了在建初初年写的两篇奏记，题目一是《备乏》；一是《禁酒》。据张宗祥先生的考证，这两篇就是《政务之书》中的篇名。

《讥俗节义之书》——见于《论衡·自纪篇》，据作者王充在这篇中自述他的写这十二篇文章的动机，是由于“俗性贪进恶退，收成弃败；充擢升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这十二篇《讥俗之书》，与《论衡之书》的分别，在于这书以“节义”为范围，而后者则对象范围较为广泛。

（参阅拙作《论王充的“政务之书”》，载1963年《杭州大学学报》10月号）

《养性之书》——见于《论衡·自纪篇》。此书一作《养生书》，是王充晚年之作，其目的是研究养生之道。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有《养气》一篇，开头说“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妄哉。”（参阅拙作“论王充的《养性之书》”见《王充卷》）。

《论衡之书》（今存八十四篇）——《论衡·对作》与《自纪》两篇均有说明。《对作篇》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把上述诸书的内容总括起来，可以有三点：一、《讥俗节义之书》十二篇，《政务之书》若干篇，和《论衡之书》八十五篇（今有八十四篇），三书内容重点，各有不同。《讥俗节义》是“志俗人之寡恩”的。《政务之书》是“言治民之道”的。《论衡之书》是“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的。而《养性之书》则是言“养生之道”的（他的《养性之书》即《养生书》是依据当时科学的医学水平而写的。也即刘勰所说“验已而作”）。二、除《养性之书》外，均是为汉代政治服务，以有利于汉家为出发点的。三、都是针对当时的虚妄之事（即不符或背离当时的科学理论、科学观点的）。

历来对王充著作所论争的主要问题，不外乎两大类：第一类是关于《论衡》的篇数问题。对这问题一般的看法是根据历代图书书目的记载，都是八十五篇，现缺《招致篇》一篇，大约亡佚于宋元之间。但也有两种具体看法，一种是认为原来有一百多篇，亡佚的篇数很多。另一种是《论衡》一书中，属入

了许多后人伪造的篇什。第二类是关于王充著述的编次问题，一般人的意见是王充的《讥俗节义》十二篇、《政务之书》不悉篇数和《养性之书》十六篇均已亡佚，《论衡之书》除缺《招致》一篇外，余八十四篇中除有少量佚文外，余均今存。但也有人认为前三种实未亡佚，现在都包括在今本《论衡》之中。——以上论争中有的已经基本解决，有的尚待继续研究、讨论。孰是孰非，见仁见智，有待读者了④。

唯物主义名著《论衡》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这是在《论衡·佚文篇》中王充自己概括出来的《论衡之书》的总精神。我们现在不妨把《论衡》八十五篇（缺《招致》一篇）加以概括地分类：

第一组 关于批判天人关系的理论（11篇）

- 自然篇 （原第五十四篇）
- 寒温篇 （原第四十一篇）
- 谴告篇 （原第四十二篇）
- 感类篇 （原第五十五篇）
- 变动篇 （原第四十三篇）
- 招致篇 （原第四十四篇）（缺）
- 明零篇 （原第四十五篇）
- 顺鼓篇 （原第四十六篇）
- 乱龙篇 （原第四十七篇）
- 遭虎篇 （原第四十八篇）

商^⑤ 虫篇 （原第四十九篇）

第二组 评论古书中所记述的天人感应说（16篇）

- 变虚篇 （原第十七篇）
- 异虚篇 （原第十八篇）
- 感虚篇 （原第十九篇）
- 福虚篇 （原第二十篇）
- 祸虚篇 （原第二十一篇）
- 龙虚篇 （原第二十二篇）
- 雷虚篇 （原第二十三篇）
- 书虚篇 （原第十六篇）
- 道虚篇 （原第二十四篇）
- 奇怪篇 （原第十五篇）
- 语增篇 （原第二十五篇）
- 儒增篇 （原第二十六篇）
- 艺增篇 （原第二十七篇）
- 问孔篇 （原第二十八篇）
- 非韩篇 （原第二十九篇）
- 刺孟篇 （原第三十篇）

第三组 关于人们认识的来源问题，及书传中的虚妄之言（8篇）

- 谈天篇 （原第三十一篇）
- 说日篇 （原第三十二篇）
- 实知篇 （原第七十八篇）
- 知实篇 （原第七十九篇）
- 定贤篇 （原第八十篇）